



# 青年政治参与何以可能与如何提升？

## ——以“青年议会”研究为基础

□ 陈庆梅 邓希泉 王语嫣

**摘要：**青年议会作为越来越多国家或地区青年政治参与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和政治参与的有效方式，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可以从体系层次、存续时间和根本属性进行大致分类，具有主体年轻化和运行自治化、选举民主化和参与制度化、运作议会化和目标焦点化等三方面的基本特征，发挥着为青年“赋权”“赋能”、提升青年政策科学化水平、促进青年与社会的正向互动等三方面的重要功能，可以拓展组织赋权和推动个体赋能的成功方面推动我国青年有序政治参与机制建设。

**关键词：**青年议会；政治参与；赋权；赋能

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0.0016

青年政治参与是维护青年群体政治权益和促进国家政治生活进步的重要方式，为青年政治参与“赋权”和“赋能”是当前青年政治参与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原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指出：“青年和学生是实现政治变革和促进更为民主的管理结构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sup>[1]</sup>。2017年7月，联合国《青年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指出：“建立法律承认的青年参与机制是青年高质量参与的基础”<sup>[2]</sup>。联合国和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建立国家青年机构和理事会、青年政策咨询理事会等制度化机构保障和推动青年政治参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出现的“青年议会”，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均发挥了以“赋权”为主要目标的扩充青年政治空间、以“赋能”为主要内容的提升青年政治参与能力的积极作用，以制度化设计方式有效应对“青年政治参与何以可能”和“青年政

治参与能力如何提升”的两大问题，成为青年政治参与领域的新现象新经验。为此，深入研究青年议会，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进程中组织青年有序政治参与具有积极借鉴意义，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青年政治参与理论和政策。

### 一、青年议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及其分类

青年议会是参照议会的形式、内容或作用，以青年作为参与主体或服务对象，由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单独或联合组织推动，旨在拓展青年政治参与途径、激发青年政治参与热情、扩充青年政治参与权利、深化青年政治参与效果而进行的一种制度化设计，其本质是非政府组织，而不是政府机构的组成部门或附属机构，也不是立法机构的组成部门或附属机构。

## 1. 青年议会的发展历程

青年议会既是20世纪中后期青年政治参与热情消退、参与态度淡漠、参与行为减少、偏差行为增多的消极现象的应对举措，也是扩充青年权利运动和非政府组织蓬勃兴起等因素的时代产物，其组织来源是以青年为主体的娱乐性、兴趣型非政府组织，大体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繁荣期的三个发展阶段。

青年议会的萌芽期大致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末。“青年议会”一词的最初使用并已具备基本要素的最初组织，是以1969年成立的加拿大安大略青年议会为标志。安大略青年议会的前身是加拿大的青年娱乐运动型非政府组织。1914年，泰勒·斯塔顿成立了加拿大基督教青年会男孩工作委员会，主要目的是通过标准、高效的培训计划来支持和促进训练营和相关会议，按照成年人的想法和标准来塑造青年，主要以娱乐活动为主，政治性并不明显，青年主体意识和行为已经开始萌发，但整体仍处于被动地位。1918年，该委员会在the Trail Rangers and TUXIS项目中发生了重大转变。Taylor Statten认为，青年男孩自己应该能够决定节目的活动，而不是成年人强加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根据这一理念，TUXIS项目启动了一年一度的“男孩议会”，同年首次在安大略省举行。经过不断发展演变，终于在1969年成立具有完全意义上的青年议会——加拿大安大略青年议会。此后一段时间，青年议会运动发展到加拿大全国级和地方级的8个组织。

青年议会的发展期大致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末再至20世纪末。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运动此起彼伏，在相当大程度上撕裂了青年与社会的关系。到70年代末，这些国家中的青年对政治的态度和行为都发生了非常大的逆转，青年政治参与进入低潮，由此呈现出一幅悲观的图景：年轻一代往往回避正式政治，选择激进的政治参与形式或者干脆退出政治进程，再加上大多数民主政体处于经济和政治动荡的气氛，对政府的核心民主理念构成明显威胁<sup>[3]</sup>。为了改善青年与社会尤其是青年与政治的关系，西方社会采取了一些修补措施，以扭转西方公民尤其是年轻公民脱离社会的趋势。青年议会因能较好地发挥青年主体作用、尊重青年在政治决策中的独立地位和核心作用，并由此成为青年正式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而脱颖而出。1998年成立的英国青年议会，有效地将青年与政治发生联系，激发了英国青年的政治参与热情与参与行为。到21世纪初，大多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立了青年议会，对政治运行体

制和政治决策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推动青年进行正式政治参与的重要替代机制。

青年议会的繁荣期大致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开始。青年议会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成立并作为一种相对成熟的制度，逐渐蔓延推广到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与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生活政治的价值观及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步影响到亚非地区的青年。因此，不仅是西方国家的青年群体愈发重视个人自主、自我表达和政治参与，亚非拉地区的青年群体的自我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也不断增强。2002年非洲青年议会和印度青年议会基金会的成立成为主要的标志性事件，为其他亚非拉国家发展青年议会做出了有益探索。此后，马来西亚青年议会、巴基斯坦青年议会、尼泊尔青年议会等陆续成立，成为青年维护自身权益和培养政治参与能力的重要正式政治参与路径。

## 2. 青年议会的发展现状

当前，青年议会已在欧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亚洲等不同程度地存在。其中，欧洲地区的青年议会的发展广度和成熟度相对较高。

在欧洲，青年议会在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基本形成了洲级—国家级—地区级的三级格局。在洲级层面，欧洲青年议会聚集着超过93个国家级青年理事会、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非政府组织，会议的运作主要由欧洲青年议会的国际委员会和设立在各个国家的国家委员会负责，由上千名志愿者具体维持运行。在国家级层面，有超过18个国家青年议会。英国青年议会由英国青年理事会管理，每年举行一次选举，每年参与投票选举的青少年大约有5万人。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较大国家的青年议会延伸到省级或区级层面，地区级青年议会的数量在不断上升。

在美洲，青年议会存在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多米尼加、巴巴多斯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其中美国青年议会和加拿大青年议会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北美其他国家。美国青年议会和加拿大青年议会或理事会是由非政府组织运营，并与相关政府部门有密切互动。在美国的许多州，青年理事会都比较活跃，向青年及时传达告知政策制定和政治决策过程。美国地方级的青年理事会，主要包括青年咨询委员会、负责青年和社区计划评估的青年研究委员会、青年或成人合作伙伴的青年行动委员会等。加拿大的省级青年议会受到青年普遍欢迎，魁北克省、安大略

省、曼尼托巴省、萨斯喀彻温省、阿尔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每年都举行省级青年议会的相关会议，不同省级青年组织的优先事项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而有所不同。在魁北克省，青年代表们主要辩论与省级政治议题的相关法案，参照立法议会的做法予以呈现；在安大略省，青年代表们主要是围绕青年问题的立法展开辩论，同时注重培养青年的领导能力、教授青年议会程序和让青年人接触新思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青年议会，则多是讨论世界问题，并为第二年的活动组织筹款等。

在亚洲，青年议会多出现在南亚、东南亚、西亚等地区，基本形成持续探索与相对成熟并存的局面。在南亚，青年议会的发展相对成熟，尤其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青年议会，已有较长时间的发展历史和较为成功的经验。巴基斯坦青年议会于2005年8月由 Rizwan Jaffar 发起成立，目前已经拥有庞大的青年志愿者网络、各个省级组织网络以及国际代表的组织网络，它能够教育、赋权与团结不同背景的青年。作为一个拥有明确的历史、使命、目标和规则的青年组织，巴基斯坦青年议会能够为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青年议会的形成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在东南亚、西亚，建有青年议会的多数国家目前仍在探索期，如马来西亚青年议会、孟加拉青年议会和西亚的阿塞拜疆青年议会。马来西亚青年议会虽然是对马来西亚议会进行的模拟，但却常常因为管理和规划欠佳而造成会议推迟或者青年参与效果不佳，时至今日该青年议会仍处于探索期。

在大洋洲、非洲也成立了多个青年议会。在非洲，有非洲青年议会、马诺河联盟青年议会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青年议会，其中非洲青年议会作为洲级青年议会，其宗旨是团结非洲青年并努力建设一个和平、公正和持久的非洲。在大洋洲，澳大利亚基督教青年会青年议会是由澳大利亚基督教青年会赞助的青年模拟议会计划，是澳大利亚覆盖面最广的青年组织，存在于澳大利亚的每个州和领地。此外，全国土著青年议会是由澳大利亚民主博物馆、基督教青年会与澳洲选举委员会合作举办的。

### 3. 青年议会的主要分类

青年议会在不同国际领域和不同国家之间或者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内部，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运作方式。通过对青年议会的主要属性进行分类，有利于全面准确了解青年议会的发展状况。根据青年议会的不同属性，可以从体系层次、存续时间和根本属性这三

个主要方面进行大致分类，如表1所示。

从青年议会的体系层次上看，可分为国际性青年议会、区域性青年议会、全国性青年议会和地方性青年议会。国际性青年议会是由联合国或国际组织为促进青年参与、推动青年发展、凸显青年作用而发起成立并提供全面支持的青年组织，或者是由分布在两个洲的两个及以上国家青年基于特定目标、在一定行为准则的规范下而建立起来的青年组织。当前，国际性青年议会主要是由联合国或国际组织发起成立的。世界青年议会是典型的国际性青年议会，该组织为来自世界各地年轻人提供一个可以反映和比较其有关个人和社会共存等至关重要问题的永久性对话论坛，具体目标是通过具体的对话形式来促进和平<sup>[4]</sup>。区域性青年议会主要是指在某一个大洲内由两个及以上国家、政府或者民间团体的成员组成，覆盖范围最广的是洲级青年议会，非洲青年议会就是由50个非洲国家的青年领导人、和平建设者和社会活动家组成的全大陆网络青年组织。全国性青年议会以全国范围内青年群体为服务对象，为其提供发声和维护权益的平台。阿塞拜疆青年议会、巴基斯坦青年议会、尼泊尔青年议会、巴巴多斯全国青年议会和印度青年议会基金会均属于全国性青年议会。地方性青年议会是指某一国家中一定地区范围内的青年群体所组织而成的青年议会。加拿大安大略青年议会、萨瓦青年议会、基督教青年会昆士兰青年议会、古吉拉特青年议会等，分别属于省级、州级及邦级青年议会。

表1：青年议会的类型及其代表性组织

分类标准	类型	典例
体系层次	国际性青年议会	世界青年议会、国际青年议会
	区域性青年议会	欧洲青年议会、非洲青年议会
	全国性青年议会	巴基斯坦青年议会、印度青年议会基金会
	地方性青年议会	基督教青年会昆士兰青年议会、萨瓦青年议会
时间形态	长期性青年议会	安大略青年议会
	短期性青年议会	俄罗斯纳什青年组织
根本属性	政府的非政府组织	英国青年议会
	纯粹非政府组织	尼泊尔青年议会

从青年议会的存续时间看，可分为长期性青年议会和短期性青年议会。长期性青年议会往往持续时间

较长、拥有较为悠久的历史背景或者对未来的战略规划。如：安大略青年议会成立于1969年，其根源在于20世纪早期加拿大有组织的娱乐活动，前身为安大略大男孩议会，经过长期发展，成为加拿大省级模范青年议会。成立于1996年的基督教青年会昆士兰青年议会和成立于1998年的英国青年议会，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在继承前人理念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青年组织。成立于1987年的欧洲青年议会，虽然没有历史根基，但组织网络延伸至2020年的欧洲青年议会。短期性青年议会多是因为社会需要或一时的政治任务而临时建立起来的青年议会。如：成立于2005年的俄罗斯纳什青年组织，是为防范“颜色革命”的发生、抵抗西方意识形态对俄罗斯青年的渗透而建立，后因“颜色革命”的退潮而于2012年终止，盛行于纳什组织内部的“青年议会制”随之衰落。

从青年议会的根本属性看，可分为政府的非政府组织（GNGO，Government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和纯粹非政府组织（NGO）。相对于政府组织而言，非政府组织是指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的具有一定程度公共性质并承担一定公共职能的社会组织，美国学者莱斯特·萨拉蒙认为该类型组织具有正规性、独立性、非营利性、自我治理性、志愿性和公共利益性等六方面特征<sup>[5]</sup>。从性质来看，青年议会均属于非政府组织，它们既不附属于政府及其下属机构，也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为青年服务为宗旨，为青年提供参与决策和发声的渠道，让青年更好地进行政治参与，从而利于其融入社会。但从青年议会与政府或立法机构的关系看，有的与政府或立法机构关系较近，是在政府或立法机构的支持下或在政府或立法的框架内成立运行的，因此具有政府的非政府组织（GNGO）性质。英国青年议会是英国唯一获准有资格在英国平民院召开会议的国家级青年组织，现已成为青年有序参与国家和地区政治事务的重要平台。有的则主要是以民间组织的形式存在，非政府组织性质更为明显。尼泊尔青年议会作为一个无党派的非政府组织，既保持了政治上的独立性、经济上的非营利性，又不受宗教的约束，是所有阶级、种姓、少数民族、人种、妇女、性别、文化、宗教等不同社会青年群体的共同平台，也是支持并促进青年学习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的社会政治运动。此外，印度青年议会基金会、斯洛文尼亚青年议会作为纯粹非政府组织，扮演着关注青年问题、服务青年群体的积极角色。

## 二、青年议会的基本特征

尽管不同国家的青年议会因地域、文化、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不同而存在诸多差异，但从其整体发展进程来看，共性是主要的方面，呈现出四方面的基本特征。

### 1. 主体年轻化和运行自治化

青年议会的参与主体、运营主体、决策主体和服务主体均是青年，主体年轻化是青年议会的最显著特征。青年的身心发展特点和社会文化特性，往往对青年议会的发展目标、任务、宗旨、选举方式和组织结构等产生重要影响，也是青年议会能否顺利、持续运转的关键所在，青年议会的议题设置、机构运营、作用体现等方面，若能青年的身心发展特点和青年发展需求一致，青年议会就得到青年更积极参与和更良性运行。青年是一个以年龄为划分依据的社会群体，青年的代际更替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青年的代际更替意味着青年议会成员的不断更替，不断为青年议会注入新鲜血液，推动青年议会能够更好地顺应时代发展并凸显时代特色。欧洲青年议会就是由16~25岁的欧洲青年运营，一年内一般会开展600次左右的活动，是欧洲范围内青年进行政治辩论、跨文化接触、欧洲公民教育和欧洲青年思想交流的最大平台，充分体现出青年议会的主体年轻化并运行成功的典型特征。

运行自治化是指青年基于自主自愿与青年议会是否发生联系以及联系的深度，主要表现为青年是否加入青年议会、是否参与青年议会活动、在青年议会中扮演什么角色和参与程度以及是否退出青年议会等方面，都能较充分地体现出青年的自主性、自觉自愿性。更重要的是，青年议会主要由青年运营，自主组织和管理青年议会，青年议会在经济独立、政治中立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力，基本不受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或立法机构及其阶层机构的控制或直接影响。自治化的运行模式既是吸引青年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条件，推动着青年为青年议会的发展积极献计献策；又是保证青年议会不脱离青年的真正需求的关键所在，实现以青年为主体、为青年服务的宗旨。多数青年议会都是由青年人运行并为青年人服务的，它为青年代表们参与社会团体事务提供了一个非政治性的环境，使得青年群体能够围绕自己的需求进行议会管理。同时，青年议会与其他政治性或社会性团体不同，它是由青年群体自发组织、自主管理的自下而上的运行模式，具有很强的群众基础和自主意愿，这为组织的良性运

行提供了良好条件。

## 2. 选举民主化和参与制度化

选举民主化是青年议会运行的重要基础。选举方式影响选举效果，青年议会的选举方式影响青年的参与意愿和参与态度，又会直接影响青年议会的运行和青年参与的效果。从整体上看，青年议会多以民主选举的方式进行成员选举、议题确定等。这样既能增加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的活跃度，又能更好地发挥青年主动积极地管理青年议会的内部事务。以英国青年议会为例，该议会的议员是每一年或两年举行一次，所有年龄在11~18岁的青年都有权进行投票，超过90%的地方教育机构举行了英国青年议会选举。青年通过选举青年议会的议员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也有利于青年议会更好地反映青年诉求和代表青年利益，使青年议会的运行和决策更加贴合青年。同时，青年议会的社会支持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使青年议会做到独立运行和民主运行。大多数青年议会的资金来源、政策支持除了内部的固有资产及成员会费之外，多是来源于企业赞助、基金会资助等社会支持，多元化的社会支持的势力均衡促成了青年议会的相对独立和民主运行。

参与制度化是青年议会运行的制度保障。青年议会的组织结构比较完善，内部治理比较高效。多数青年议会组织结构完善，具有多层次的管理部门、明确的责任分工、自愿性的议员群体等，从整体上提高了青年议会的运行效率。欧洲青年议会的内部结构包括国家委员会、管理机构以及国家委员会理事会等，每个机构都有较明晰的职能，以保证管理结构透明、有效和民主。在此基础上，借鉴参考本国议会的运行方式、吸收运用他国青年议会的成功经验和运行方式、积极运用非政府组织的组织优势，相当多的青年议会形成了一套相对健全的成员招募、选举制度、运行规则、议题设置、决议运用、社会宣传等制度设计，为青年议会的良性运行和持续发展提供制度约束和规则保障。在多数青年议会中，作为成员的青年进行政治参与必须通过正式渠道、遵循相应规则、履行相应义务、承担必要责任，既通过制度规则确保青年拥有更充分的政治参与权利，又通过组织规范约制青年的政治参与行为，从而实现青年议会的良性有序运行。同时，青年议会比较完备的组织制度，既增加了青年议会的权威性，又确保青年政治参与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比如，英国青年议会非常严格的行为准则和完备的制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英国青年的政治参

与和该议会组织的良好运转。

## 3. 运作议会化和目标焦点化

青年议会是既从名称又从实际运行等方面全面参照议会来进行，运作议会化无疑是青年议会最外在的表征和最凸显的组织结构。运作议会化，是指青年议会从成员构成、选举方式、内部结构、管理运行等方面都有着规范化的标准，是对该国议会的机构设计、议题设置、组织规范、运行流程等方面的全面借鉴、高度模仿和创新运用。青年议会还通过组织青年议会成员或其他相关青年在国家或地方议会中作为临时成员进行观摩，或者作为议员助手进行参与，或者由经验丰富的议员组织青年议会的会议等方式，来让青年了解议会的运作、决策。欧洲青年议会的内部组织和运作流程等，都与欧洲议会极为相似，包括有不同的委员会和多样的辩论主题，会议前准备、团队建构、委员工作和委员会大会等主要程序为主要内容的整个议会流程也很完整，培训、演讲、辩论和协商等环节的议会讨论和决策过程丰富，在相当大程度上复制和体现出议会的特征。

青年议会成立的目标就是拓展青年政治参与空间、提升青年政治参与能力、强化青年对现有政治力量的认同、减弱青年的政治冷漠、推进青年通过政治参与形成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为此，青年议会的成立、运行、计划、项目等均是围绕这些目标来进行。可以说，目标焦点化是青年议会的关键。大多数青年议会都有组织章程或组织规范，对组织的发展目标和宗旨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围绕组织目标和组织宗旨，进行组织结构、组织规则、组织运行、组织奖惩等方面的设计，使青年议会的议题、项目、政策、措施等围绕发展目标展开，从而既保证在相对明确的组织发展方向指引下青年议会的各个组成部门有序开展相关工作，又能保证青年议会以青年为主体的独特性。非洲青年议会的发展目标和宗旨是长远性和阶段性、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统一，以青年发展作为议题中心、决策中心、目标中心，目标简明而清晰，既为议会运行定下整体基调，又推动着青年议会稳定向前发展。

## 三、青年议会的重要功能

青年议会作为青年政治参与和非政府组织相结合的一种政治现象，对青年发展、社会决策，以及青年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 1. 为青年“赋权”“赋能”

青年群体在社会结构中整体处于弱势地位，在政治结构尤其是政治权力结构中的空间更窄，在政治话语权尤其是群体利益博弈过程中的能力更弱，具体表现为青年政治参与的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足、政治话语权和议题设置能力较弱、利益诉求渠道和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青年发展空间尤其是政治空间有待拓展。在传统的政治格局中，青年政治冷漠现象甚至青年街头运动和集群事件表现出来的政治偏差行为，成为严重影响青年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青年议会是对传统政治格局的一种突破，是拓展青年政治空间、激发青年政治参与热情、提升青年政治参与能力的制度化安排，集中体现为“赋权”和“赋能”的作用。“赋权”就是通过构建青年议会作为青年专属的独立政治参与机构，为青年政治参与扩充政治权利和拓展政治空间，在较大程度上摒除了成人世界的主导地位及其对青年政治参与的控制干扰等，为青年群体充分发表看法和展现诉求提供了一个相对自主新的政治空间。“赋能”则是基于青年议会这个新的政治参与平台，拓展青年政治参与的渠道，扩展青年政治参与能力提升的途径，丰富青年政治参与的实操机会，提升青年政治参与能力。青年通过参与青年议会，提升了对政治体制和政治现象的认知水平，加深了对政治运行过程的了解程度，加强了对政治现象的理解能力，习得了议题设置、宣传发动、动员组织、团队协作、参政议政等政治参与能力，提高了对现有政治格局的信任度和合作度，丰富了在政治结构中进行博弈的渠道，自我效能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 2. 提升青年政策科学化水平

青年法律法规、青年政策、青年项目、青年活动等以推动青年发展为主要目标的青年工作，需要基于青年发展规律以及当下青年的新特点新需求新问题而制定实施。青年议会作为推动青年发展尤其是青年政治参与发展的青年工作创新，比较有效地推动青年对政治现象、政治问题、群体利益等进行较充分的讨论，深入阐述观点看法和表达利益诉求，既能反映出青年群体的整体诉求和时代需求，又能较好地反映出青年群体中不同阶层、文化、民族等青年亚群体的个性需求，有利于青年政策、青年项目和青年活动等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决策参考。青年议会通过为青年提供发声平台，让青年遴选所关注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借此反映青年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从而为政府在青年政策方面提供客观依据。青年议会为青年及

其同辈群体与议会的议员之间建立联系搭建桥梁，既为议员更好地接触青年和了解青年民意提供了制度设计，也有利于青年群体在议会中寻求青年群体的利益代言人，从而为青年影响议会的政治决策提供了重要媒介和作用路径。同时，青年议会为政府制定全国性或地区性甚至国际性的青年发展战略、政策、项目和措施提供决策参考。青年既是利益诉求的表达者，更具有关注世界和未来的理想抱负和参与激情；青年不仅关注与青年群体相关的问题，更会考虑到整个社会成员甚至是世界和未来的利益问题和发展问题。在青年议会中，青年除了表达自身利益需求之外，还会参与国家层面的政治民主建设，针对当前的国内国际公共问题发表意见，这有助于政府广泛收集民意、合理制定政策。对于那些参与国际性青年议会的青年来说，他们针对全球性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为全球性组织制定发展战略提供积极参考。

### 3. 促进青年与社会的正向互动

青年与社会是一种矛盾的存在。社会需要积极吸纳青年，但是对青年进行基本社会化过程会使青年掉队或使青年偏离社会预设的发展轨道；青年既需要按照社会规范和社会期待融入社会，又总是在对社会的顺从与偏离中获得自身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青年的政治冷漠与政治参与的偏差行为，就是对社会的偏离。青年议会是对青年在政治方面偏差行为进行矫正纠偏的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青年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从宏观层面看，青年议会为青年个体之间、个体与政府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平台，让青年们接触到相关事实，并讨论自身想法和经验，分享解决社会面临挑战的方案。当他们彼此之间有矛盾或者摩擦时，议会的青年代表可作为中介进行协调，从而使得双方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国际青年议会则为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青年搭建了桥梁，促进了国际之间观念、理解和实践的跨文化对话与多样性。从微观层面看，青年议会通过组织青年群体观摩并体验议会流程、围绕主题进行辩论和遴选本年热点问题等方式，加深青年对政治生活的了解，增强青年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感和使命感，从而凝聚青年力量为国家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做出贡献。青年议会通过多元化的社会支持，将青年、政府、社会、企业等不同性质的利益群体整合在一起，增加了社会支持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使青年议会的内外部系统实现和谐运转，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尽管国外青年议会已经在组织赋权、青年发展、资源整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甚至是由于制度缺陷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局限。一是覆盖面有待提升。青年议会在许多国家即使是有议会制的国家尚未设立,更多的国家青年议会地方性不强甚至没有。二是形式化较明显。许多当政者往往将青年议会当作政治点缀,实际根本无力有效回应或认真对待青年人的政见,而如果这种现象长期存在,无疑会挫伤青年参与者的参政积极性<sup>[6]</sup>。这被称作“毫无意义的象征主义的做法”,这种做法容易导致民主空心化,如果不加以整治的话,很可能会再次引起青年的政治冷漠。三是实效性有待强化。青年议会一般会形成组织决议或会议成果,主要表现为组织报告、法案草案、决议和建议、宣言、宣传活动和新闻稿等。尽管这些组织决议或会议成果的数量众多、形式多样,并且会提直接提交给相关政府或由立法机构转交给相关政府,但对政府最终决策产生直接影响的作用非常有限。虽然青年议会程序的结果会在媒体和电视上广泛传播,或者经常作为建议发送给国会议员或政府部长,但它们很少在公共政策领域实施<sup>[7]</sup>,青年的声音依然很难有效传递到实际的政治舞台,进而影响青年议会的实际效果。

#### 四、青年议会的成功经验与中国青年有序政治参与的有益借鉴

青年议会作为一种相对成功的新型政治制度设计,具有可推广的共性经验。对于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程中促进青年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任务来说,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我国青年政治参与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 1. 拓展组织赋权

从组织赋权角度看,青年议会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积极措施。一是构建了国家政治制度运行和青年政治参与的有效衔接机制,减少了青年群体与政治权力核心地带的隔离屏障,使更多普通青年有机会进入到政治权力尤其是国家政治核心地带的运行决策进程之中,较大拓展了青年在政治权力核心地带的参与空间。二是青年参政议政的可达性和公平公正性的增长,使更多普通青年比较容易地获得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平台,并且能够不因民族、种族、文化、性别、阶级、阶层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遭遇政治参与歧视,较广泛地拓展了青年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大多数国

家的青年议会,是该国所有阶级、种姓、少数民族、妇女、性别文化、宗教等各阶层的共同平台,最大限度地不同信仰、不同阶层、不同利益诉求的青年群体聚合在一起,使其能够自由地表达自身观点、维护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

借鉴青年议会的成功经验,从组织赋权角度推动我国青年有序政治参与,建议采用两步走的发展策略。第一步,在全国、省级、地级、县级这四级人大或政协的某级或某地开展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青年助手计划,使普通青年作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助手参与到国家或地方的政治权力中心地带。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青年助手,可以承担民意调研、民意收集、现场观摩等职责。第二步,在全国、省级、地级、县级这四级人大或政协的某级或某地同步开展青年人大或青年政协的模拟会议,在同级人大或政协召开的前期或同步召开会议,推动青年更广泛深入地了解政治权力的运作机理。

##### 2. 推动个体赋能

从个体赋能角度看,青年议会有三方面的成功经验。一是为青年执掌运行青年议会赋能。青年议会给青年赋予了运行和维护该组织的权力和职责,确保青年在自己的组织中的主体地位并按照青年群体的意志开展活动。二是为青年在议题设置和行动决策中的主体性赋能。青年议会强调青年组织成员的年轻化、普遍化,强调对所有青年群体的可及性、公平性和公正性,降低青年进入青年议会的门槛以实现青年议会成员的丰富性、流动性、多元性。三是为青年提供实操机会赋能。“良好的政治参与是一种适应现代公民生活的必备素质和能力,可以通过理论教育、情境模拟和日常实践来进行培养”<sup>[8]</sup>。青年通过青年议会,不断提升政治理论知识的认知水平,习得政治议题设置、政治权力运行的相关经验和实际能力,通过观摩议员和参与政治互动等政治实操提升了政治参与能力,等等。

借鉴青年议会的成功经验,从个体赋权角度推动我国青年有序政治参与,建议采取三方面的改善措施。一是为青年在青年组织中的主导地位赋能。在共青团系统以及在广大的青年社会组织中,赋予青年更大的自主权和主导权,更加强调青年的主体地位,充分相信青年并放手青年。二是为青年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赋能。要推进和丰富青年正式参与渠道建设,提升青年参与的可及感、公平感、效能感。要从更多现实平台和网络平台征求、吸收、借鉴青年利益诉求和青年呼声,在政治决策尤其是青年政策和青年工作方面

的决策时吸引更多青年参与讨论。在更多青年组织中推动民主化工作方式,加大组织内部的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的范围。三是为青年组织的青年管理人员赋能。要注重对青年组织管理人员各方面素质的培养,加强其对整个团队的大格局及能力培养,实现组织内部的内生性健康发展,提升青年组织和自我管理的社会治理水平,实现青年的自我管理与社会管理的统一、青年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青年融入社会与社会吸纳青年的统一。■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一般课题“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研究”(课题编号:17BKS080)、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立项课题“中国青年发展蓝皮书(2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陈庆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系硕士研究生  
 邓希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王语嫣: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陈晨

#### 参考文献:

- [1] 联合国秘书长. 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DB/OL]. [http://www.un.org/chinese/ga/56/doc/a56\\_180.pdf](http://www.un.org/chinese/ga/56/doc/a56_180.pdf).
- [2] 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 青年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秘书长的报告)[EB/OL]. <https://undocs.org/zh/A/72/190>. 2017: 11.
- [3] [7] Shephard M, Patrikios S. Making Democracy Work by Early Formal Engagement?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of Youth Parliaments in the EU [J]. Parliamentary Affairs, 2013, 66(4).
- [4] World youth parliament. A thrilling Challenge [DB/OL]. <https://en.wyparliament.org/about-us/>, 2019-08-22.
- [5] [美] 莱斯特·萨拉蒙, 等. 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6] 周长鲜. 英国青年议会及其对国家认同的塑造机制[J]. 新视野, 2016(1).
- [8] 邓希泉. 青年政治参与政策与青年发展[J]. 中国青年研究, 2015(2).

(上接第61页)

#### 参考文献:

- [1] 孙文中. 教育流动与底层再生产——一种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的研究[J]. 广东社会科学, 2016(4): 211-219.
- [2] 傅剑, 陈碧霞. “蚁族”的群体特征、诉求与风险[J]. 当代青年研究, 2014(2): 106-111.
- [3] 刘荣. “凤凰女”的生存与婚姻困境的社会学分析[J]. 当代青年研究, 2015(5): 116-121.
- [4] 张学东. 对“凤凰男”与“孔雀女”婚姻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09(4): 13-16.
- [5] 李鹏桀. 给予与获得: 农村籍大学毕业生择偶中的匹配与交换[D]. 郑州大学, 2016.
- [6] 黄佳鹏. 代际合力、婚姻市场与婚配梯度——以鄂西茅坪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为例[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2): 82-90.
- [7] 陈讯. 婚姻要价、代际支持与农村青年城镇化——基于晋西北W村调查[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2): 18-23.
- [8] 王庆明, 王朝阳. 人情冷暖与亲属实践: 中国乡村婚姻困境的一种解释[J]. 开放时代, 2019(2): 101-120.
- [9] 李强, 邓建伟, 晓箏. 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 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J]. 社会学研究, 1999(6): 1-18.
- [10] 程猛, 康永久. 从农家走进精英大学的年轻人: “懂事”及其命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5): 68-75.
- [11] 林晓珊. 境遇与体验: 一个阶层旅行者的自我民族志[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7): 15-23.
- [12] 李飞, 杜云素. 资源约束下的苦难与超越: 高学业成就农村青年的求学史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7): 5-14.
- [13] 王宁, 马莲尼. 目标导向与代际社会流动——一个能动性的视角[J]. 山东社会科学, 2019(4): 50-60.
- [14] 肖富群, 张登国. 农村与城镇大学生初次就业的差异——兼论农村大学生的就业特征[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5): 67-75.
- [15] 顾辉. 教育: 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预演——一项对H市两所高中的研究[D]. 上海大学, 2010.
- [16] 胡建国, 李伟. 90后: 结婚必须有房吗——基于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的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6): 67-72.
- [17] 时广军. “过度教育”与“过度单身”——当代青年社会流动的代价[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4): 34-39.
- [18] Blau Peter M, O D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M]. New York: Wiley Free Press, 1967.
- [19] 王晓磊, 杨晓蕾. 夫妻教育匹配对婚姻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J]. 西北人口, 2019(2): 107-118.
- [20] 张翼. 中国阶层内婚制的延续[J]. 中国人口科学, 2003(4): 43-51.